

定南县志

资料
选编

第三辑

定南县志编纂委员会編

編 者 的 話

《定南县志·资料选编》刊发二辑以后，我们收到了许多热情洋溢的来信，表示赞许和支持，认为它能起到保存史料，及时提供参考为现实服务的作用，希望能够继续编辑刊印，同时也听取到许多反映：认为它所涵纳的内容不够广泛，质量也有待提高。“兼听则明”，这都是热情爱护本《选辑》的由衷之言，我们深表感激。

在上述基础上，我们选编的第三辑又问世了，这辑一共选刊了十八篇文章、资料。还是力图从各方面和角度上来逐步显示定南县的古往今来，力图能客观的描述建国以来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前进的轨迹。

“创业艰难百战多”！建国后首任县长廖盛敬同志在病瘫的情况下为我们撰写的《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安定社会新秩序》回忆录，正是反映了这样的历史事实。

丰富的自然资源，适宜的气候条件，为定南发展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提供了良好的客观基础。如何充分认识和掌握客观的经济规律、自然规律来开拓前进呢？我们选刊了《九曲水电站建站纪实》和《定南县四邻界限初探》等六篇文章。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四十周年，定南人民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中，作出了贡献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前事不忘，后事

之师”，我们从《江西省近现代地方文献资料汇编》中辑录成《定南县抗日战争之损失》三个统计表。

从保存历史资料并使之系统化便于利用着眼，我们除整理了定南县解放后历任党政领导人员名单外，还从旧县志、旧档案中整理辑录了定南自建县以来到解放时止的历任主管官员名单以及定南籍历朝取士及授官名单。这种整理辑录也是县志编纂工作所必从事的。但须说明的是：由于历史档案不全，所辑录之定南自建县以来到解放时止的历任主管官员名单，必有遗漏和错误，深望能得到各界的帮助，获得纠正和补充。

《地名巧联乡土情》这一短文，别具一格。作为定南民间的轶闻风情，选刊出来，想必会引起许多人的欢迎和遐想。

赘言之后，再次向大力支持、热情关心定南县志编纂工作的同志、专家学者、知情人士表示深深的敬意！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目 录

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安定社会新秩序

——我的回忆……………廖盛敬(1)

定东人民护乡队简介……………本 室(11)

定南县民工参加抢修鹰厦铁路……………钟世仁 李房宗(14)

定南县茶叶发展小史……………程宣德(17)

九曲水电站建站纪实……………吴文彪(23)

定南县二轻机械修造厂发展之路……………张仲仁 李房宗(30)

回忆国营云台山垦殖场……………刘 俊(34)

定南中医院概况……………任金全(38)

记定南著名伤科医师钟块古先生……………善 纪 正 之(42)

定南县抗日战争之损失……………本 室(46)

龙头对日作战目睹记……………郭剑山 郭迪民(50)

定南县四邻界限初探……………何文鹏(53)

地名巧联乡土情……………钟咏春(55)

解放后历任中共定南县委正、副书记名单……………本 室(56)

解放后定南县历任正、副县长名单……………本 室(59)

民国时期定南县历任知事、县长一览表……………本 室(64)

明、清时期定南县历任知县一览表……………本 室(66)

明清时期定南县籍取士及授官一览表……………本 室(79)

巩固人民民主政权 安定社会新秩序

——我的回忆

廖盛敬

定南是个小县，人口稀少，地处偏僻，与广东省交界。

定南县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一日解放的。我们去定南之前，南下部队已有一个团进驻了定南。上级决定派我到定南任人民政府的县长，命令下达后，我们从赣州乘汽车到龙南，然后由驻定南的部队派人来接。我们一行五人，其中县级领导三人：县委书记彭山，组织部长蔡元真（女）和我，另为高砂区委书记赵良栋，新城区委书记张华。我是定南解放后的第一任县长，县长上任是要张贴布告的，这不仅仅是传统习惯，更重要的是宣告县人民政府的诞生，对公开或隐蔽的敌人起威慑的作用；对于广大人民则是给予了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我们来到定南，沿用传统的建制，把全县划为五个区：新城区（城关）、高砂区（老城）、天花区、鹅公区、谭庆区（月子）。划分了行政区，干部却派不出去，除赵良栋、张华外，全县还缺三个区书，五个区长。县直机构也无法成立。干部的配备成了我们当务之急，是最大的问题。当时，

我们干部来源有三种：一是向赣州地委写报告，请上级派一些干部来，经县委研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先后去赣州地委要来几个干部：天花区委书记铁自元、鹅公区委书记王兴克、月子区委书记王玉璞。区委书记总算配齐了。不久，地委又陆续派来一批南下干部。这样，我们又配了鹅公区区长刘来仁，新城区区长陈维章，其它三个区实在难以配齐，只好暂缺。后来地委又派来一个财政科科长冯琪祥，来后不久在去赣州地区要经费的途中，被敌机炸死，牺牲在定南与龙南二县交界的地方。他工作热情高，业务能力强，可惜来不久就牺牲了。

二是向广东上来的游击队商调。和平县与定南县交界，当时定南有个地方游击队，有几十条枪，但这支游击队成份复杂，派系斗争很厉害，其中一派因意见分歧，脱离了定南游击队到和平县去了。县委经过认真的研究分析，认为参加和平县游击队的一派成分要纯一些，政治上可靠些，于是我们就请和平县游击队在原属定南县的那一部分人中间挑选一些干部派回定南。因和平县也是刚解放，干部也缺，经多次联系，他们只同意给我们几名干部，一名是朱鑫华，另一名叫陈兰台，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到定南后身兼两职，任县委和县政府秘书。另几名现在忘记名字了，当时，区、县干部中有文化的人极少，和平县的工作铺开后又把这位秘书要回去了，只留下朱鑫华一人。县委在这种机构不全、干部奇缺的情况下，经过不断的努力，开辟了定南县的工作局面。不久，地委又派了几名南下工作团的干部来定南工作，他们是苏福兴、傅枢弼、冯健美（女），还有几位姓名记不清了。

后来上级从南昌“八一革大”派来了一批学员，这些年青人朝气蓬勃，思想解放，是我县干部队伍中的一支有生力量。男女都有，现在还能记起姓名的有：肖平、喻中行、彭菊英、邓宸荣、廖士祥，这些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培养，有的当了区长，有的成了县委和县委政府的干部。和平县要走了商调的那位秘书后，我们又向地委要了一名秘书，是姜万荃。初期县直机关的许多负责人姓名都记不起来了，仅记得县粮食局长阎桂兴、教育科付科长杨思行、建设科只有一名科员姓彭。县公安局的第一任局长由南下部队的一名保卫股长兼任，后由李迺勤接任。定南县中学也派去了干部，校长由我兼任。

我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到定南，到一九五三年六月调走，前后三年多的时间。回忆在那风风雨雨的时间中，在这个新建立政权的地区，除了建立机构和训练配备干部外，中心任务就是借粮支前、减租减息、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贯彻婚姻法。

借粮支前主要是采取借的办法，主要对象是地主富农，也向中农借，但数量很少。把粮食借来后送到前方，以后再从被借户应交公粮中扣还。

解放初期，定南县大概只有七万多人口。境内山高林密，又是赣粤交界之地，真是“山高皇帝远”，土匪横行，匪患炽烈。国民党部队溃败时，有许多执迷不悟、恶习不改的歹徒在定南山区潜伏下来，他们与当地的地主武装勾结在一起，袭击我人民政权，杀害共产党的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如果不尽快的肃清这些反动分子，定南县的工作就无法开展。主力部队派了一个团驻在定南，加上县大队，我们

的力量显然是占优势，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为我们剿匪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形势，县政府的剿匪通令贴出去以后，许多零星小股土匪就再不敢轻举妄动了，有不少匪徒向我政府自首，表示改恶从善，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但是也有几股自以为实力雄厚的土匪，怙恶不悛，顽固不化，公开叫嚣要与人民政府较量。除了公开的土匪外，定南解放前夕还有许多地主武装，公开旗号是自卫队，是为了“保境安民”，实质就是保护地主豪绅的利益，这种武装，一般都有很好的庄园，四周都有碉堡，设防坚固，武器也不少，而且很多人还会造枪。国民党溃退时丢下的枪支也被他们弄去了，解放后，他们把人和枪支都分散隐蔽起来，暗地里仍与土匪来往，窝藏被迫剿的匪徒。当时定南确是局势动荡，谣言四起，使我们的开辟工作困难重重，人民群众根本不敢公开接近我们，我们下乡时得带上部队，干部随身带上手枪，准备随时战斗，否则就要吃亏。有一次在鹅公区公所门口，一个叫彭炳善的惯匪混在群众中间，企图待机打死我们，因见我们人多，子弹都上了膛，才心虚胆怯的不敢下手。后来他混进了广东海县北部山区的一个乡政府当了炊事员，我们知道后派人把他捉了回来。还有一次，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到地委开会去了，土匪知道后，乘机窜到县城附近，切断了县城通往外地的电话线，猛烈攻城，幸好县公安局刘股长和县大队张大队长都有战斗经验，刘股长把城内的干部和基本群众组织起来在城内打，张大队长带着战士往外冲，用几条机关枪回击敌人，敌人一看我们的力量并不弱，不敢久战，很快就撤退潜逃了。

天花区有个五户乡，山高林密，人烟稀少，是土匪经常

出没之地。一天，土匪突然包围了我乡政府，凶残杀害了我乡政府的工作队员共六人。五户事件发生后，我们召开了一个声势很大的追悼大会，我在那次会上讲了话，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检举揭发，起来与匪徒作斗争。大会以后，我带了一连武装部队到了天花区，在那股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转，几天后，我们住进了天花区公所后面的一个山沟里，分散到各家各户去调查访问，做一些知情人的工作，因为这个村子里有许多人参加了土匪队伍。开始，没人敢说实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没有参加土匪的家庭怕日后遭到匪徒的报复；二是土匪的家属对我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有怀疑。针对上述情况，我们也采取二种措施，一是调查访问不漏一家，并对谈话内容绝对保密，这样做，就是万一日后土匪回来也难以知道谁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二是对不同对象，开展不同的工作。对一般群众是宣传清匪反霸的必要性，宣传我人民解放军在西南剿匪的胜利，鼓舞斗争勇气。对那些土匪家属则是讲清政策，指明出路，促使他们动员亲人弃暗投明，脱离土匪队伍，改恶从善，重新做人。几天工作以后，群众觉悟高了，积极分子就偷偷把土匪经常宿夜位置告诉了我们。我们掌握时机，在一所庙宇的周围密林中布置了隐蔽哨，果然一天傍晚，匪徒们窜进了这座庙宇。我们迅即包围了这座庙宇。考虑到这股土匪中有许多是受骗上当为匪的群众，他们并不甘心为匪，有的对我党政策缺乏认识，有的是当初受匪首胁迫而为之的。因此，我们首先展开政治攻势，对他们喊话。喊了一阵后，庙里没有什么动静，我们又从村里请来一位有声望的长者，请他指名道姓地

对庙里喊话，过了一阵，庙里有了骚动，但仍不见有人出来投降，我们迫于无奈，只好施行火力进攻，当场击毙了几名匪徒，冲进庙内。因为庙里大多数人并不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没作顽抗，经过一番战斗，庙里四五十人就全部成了俘虏，缴了不少武器。我们把俘虏押回村里，关在一栋房子的楼上进行审讯，在基本查清后，准许大部份取保释放。为了不给这个村留下后患，规定担保人必须是这个村的基本群众。几名罪大恶极，证据确凿的首恶分子，我们带回交公安局关押，待五户乡事件进一步查清后再处理。

国民党二十三军溃败时，有几十名兵痞潜回定南隐蔽下来，后钻进大山里当了土匪。为首者何澄鑑，定南人，是二十三军的团长。据说此人在1946年胡宗南进攻我陕甘宁边区时，何曾窜进延安枣园，在中央首长的住地看到一对石狮子，每只重约三十斤，何竟抢为已有，用木箱把石狮子千里迢迢运回定南家乡，定南解放前夕，他把那对石狮子和校官服一齐埋在地里，土改时被我们挖了出来。没料到他原想用石狮子炫耀他的反革命功绩，倒成了他反革命的罪证。那时何澄鑑纠集的这股土匪，多是定南本地人，社会关系多，地形熟，又都是在国民党正规部队混过，有一定的军事知识，能打善跑，武器齐全，他们自称为地头蛇，气焰十分嚣张，对人民群众威胁很大。但他们毕竟是人民解放军手下的败将，在南下大军“横扫千军如卷席”、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下，他们如惊弓之鸟，漏网之鱼，只敢在山里钻进窜出，不敢轻易下山。

土改开始以后，驻定南的主力团奉命换防，接防部队还没有到，何澄鑑认为有机可乘，从深山里溜出来，妄图搞

乱。他那知群众经过清匪反霸，双减和土改，斗争觉悟早已提高了。在群众大力支持下，我们很快就获得了何匪的动向报告，何匪一下山，我们就带着经过整顿的县大队进了高砂区，包围了他隐藏的那片山林。我们采取拉网搜山的办法，逐步缩小包围圈，最后只剩下一个山头，仍然没有发现何匪。我们决定围而不搜了，待他断粮后自己跳出来，避免敌人在暗处射击我们而招致伤亡。果然不出所料，几天后，何匪叫他的警卫员下山去寻找食物，被我们抓住了，经审问得知何匪隐藏的具体地点，县大队立即包围了那地方。何匪也很狡猾，他等警卫员下山后，立即换了地方。我们没有急于搜查，只是再缩小包围圈，他再也无法逃脱了，最后，他开枪自杀了，这个怕死鬼没有打中要害部位，没有把自己打死，倒在地上呻吟。当我们围上去时，一名战士想冲上去抓他，被大队长拉住了。大队长不愧是侦察员出身，他命令大家散开卧倒，自己站在一块石坎旁，用手枪指着何匪，喝令他 把武器交出来。何匪哼着说枪丢到山下去了，大队长命令他把压在腰后的右手抽出来。何匪孤注一掷的诡计被识破了，只得把握在右手的枪丢了过来。几个战士跑上去把他捆了起来。何匪自杀后流血过多，我们估计他活不了多久，来不及请示地委，立即召开了公审大会，历数他的罪恶。经群众强烈要求，把何匪就地正法了。事后，我们向地委作了汇报，地委认为我们处理是正确的。

在五户乡疯狂杀人的股匪以及何澄鑑股匪被肃清以后，其它零星的小股土匪有的窜往外地，有的销声匿迹，定南境内的匪患基本平息了。地方局势安定多了。县委决定，按照上级部署，抓紧时机进行土地改革。

我们在1950年冬开始土地改革试点，接着就在全县铺开土地改革。1951年夏，县委书记彭山同志调赣州市任付书记，由我接任县委书记。在土改初期，为了搬去压在广大贫苦农民头上的大山，我们杀了一些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也杀了极少的几个十分反动的富农。。

鹅公区有个恶霸叫彭汉山，曾在国民党新一军当过副官，新一军在东北被我们打垮后，他窜回老家。彭姓在鹅公区是个大姓，他在彭姓宗族里又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们到定南后，开始想争取他，运用他的影响为人民做点有益的工作。但这个人恶习不改，利用我们给他将功赎罪的机会，去向何澄鑑风通报信，给我们的剿匪反霸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当我发现他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后，立即逮捕，公审后就枪毙了。

还有一个有名的恶霸叫廖钊监平，是高砂区一个大姓族的头子。解放后仍然无恶不作，民愤很大。有一天他竟提着一篮香菇和土特产来到县政府找我。他说：我们都姓廖，是一家人，听说你就是从我们定南去参加革命的；又说：你负过伤，现在身体不好，这点东西送给你补补身子。我对他宣传了一阵共产党的政策，然后吩咐警卫员把他送了出去。后来这个人也被镇压了。

在镇压反动富农时，我们是很慎重的。如果没有十分严重的现行罪恶，是不用极刑的。记得有一个妇女，娘家贫苦，婆家是户地主，没收她家的土地时，她趁黑夜放一把火，不仅烧了她自己的房子农具，还殃及了几户邻居，纵火后，她就跑到和平县躲了起来，对这种公开破坏土改的坏人，如果不镇压就不利于土改运动的进行。我们只好派人把

她从和平县抓了回来，宣布她的罪行，把她镇压了。

我们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宣传婚姻法。这个运动在封建势力非常顽固的赣南山区，所遇到的阻力是很大的。解放以前，定南的婚姻关系全部是父母包办的买卖婚姻。如“怀胎亲”（孩子还没生下来就定了亲）等等。妇女被卖之后，一切都由男人主宰。轻则打骂，重则捆绑，甚至转卖、杀掉也任意行事。贯彻婚姻法时，有人就公开的杀人抗拒。为了扫除障碍，使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妇女的婚姻自主和生命安全得到保障，我们也不得不杀掉两个男子和一个妇女。

高砂区有个妇女，因不愿再受她男人的虐待，在贯彻婚姻法时，抱着孩子往县里跑（要跟她丈夫离婚），她丈夫在后面紧追不舍，赶上后将他妻子活活砍死了。为了伸张正义，我们召开了大会，把这个杀妻犯镇压了。鹅公区有个男的，一次为了一点小事跟他妻子发生口角，女的顶了一句，他就抄起家伙把妻子毒打一阵，他妻子疼痛难忍，夺门而逃，想到乡政府找干部评理，她丈夫象发疯了似的在后面追，女的心慌意乱，跑着跑着跌倒地上，她丈夫就用脚踩在女的身上用菜刀将自己的妻子活活砍死，血流满地，惨不忍睹。我们立即逮捕了这个凶手，公审以后，把他枪毙了。

月子区有一对夫妻，男的姓李，比较老实，女的姓郭，非常邪恶，作风极端败坏，与许多国民党的军官、地痞流氓鬼混，而且还伙同这些家伙糟塌了许多良家妇女。她自己不生孩子，就买了一个小姑娘，仅仅在进门这天给那小姑娘吃了一顿饱饭，以后全给她吃些残菜剩饭或糠菜。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姑娘在她家七年，经常被她用铁链锁在床底

下，链子很短，人都站不起来，晚上只能睡在床下。群众偷偷地报告了妇联，我们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就派人从姓郭的这个恶婆家里把这受尽了折磨的姑娘救了出来。此时姑娘已经十八岁了，但蓬头垢面，骨瘦如柴，两眼昏暗，站都站不起来。姑娘的悲惨遭遇激起了公愤，群众纷纷要求人民政府严惩罪犯。我们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报经上级批准，于1953年三八妇女节那天，将那个姓郭的恶婆镇压了。

回顾我在定南工作的三年多点时间里，正是我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之初，当务之急是巩固新生的政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彻底推倒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扫除匪特，打击封建势力的反动气焰，为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以及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铺平道路而斗争，如不广泛的发动群众自己起来斗争，如不对敌人实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人民民主政权何能巩固？社会主义社会从何而来？这已被铁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上接第52页）

受了八年抗战的老百姓高兴得流下了热泪，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余汉谋的司令部 and 军用物资又从阳佳迁运到了寻邬，以后我就不清楚了。

定东人民护乡队简介

定东人民护乡队（后称定东游击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二支队第六团领导下的一支地方游击队。建立于一九四九年六月。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胜利以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定南在广州读书的杨思行、曾祥堃等同志，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于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间，陆续回到定南，通过各方面联络，酝酿组织武装力量，积极争取党的领导，五月间，通过肖声（原名肖日旺、系东二支六团的陈兰台部通讯员）的介绍，与东二支六团团长林镜秋同志取得了联系。

六月十四日，林镜秋同志派军代表黄佐（又名黄树阳）来领导，并与杨思行、曾祥堃商定在黄沙岗召开会议，研究筹集枪弹，组织革命武装等事项，后定于六月二十四日（即古历五月二十八日）在天花朝阳山集中，当晚，曾祥堃带领四十余人，先到朝阳山集中，由黄佐同志进行了政治动员和纪律教育，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当得知国民党保安团和联防队企图围剿朝阳山时，当夜就把队伍转移了，第三天到达和平县的油竹坝，受到东二支队的欢迎。同时批评了黄佐没有很好执行“隐蔽活动”，过早亮了牌子。指示“解放定南，容缓进行”。由曾祥堃回去联络杨思行这部份人员，其余人员留在油竹坝，由黄佐负责和东二支

队人员一齐学习”。还抽调了几个人去和平政工团学习。

杨思行接到黄佐的通知后，带领三十余人，星夜赶到朝阳山，由于情况变化，曾祥堃带领的人员已转移，杨也带人转移到和平县城之石含与曾祥堃取得联系后，留下杨力行带队，杨思行赴油竹坝向林镜秋汇报，因林已走，转移到老隆支队司令部汇报，要求派人加强领导。

黄佐、曾祥堃这部份人在油竹坝学习十多天后，返回龙川樟田与杨力行这部份人员会合后，在江广交界地活动。其间黄佐曾派十余人随东二支主力去上坪、吉祥等地参加战斗。

定南境内的省保安团、武警队，天花、穆湖的联防队，严密封锁，使定东游击队粮食供给十分困难，被迫化整为零，分散回到定南境内的红阳、桃溪等山地活动。由于敌人采用抄家、威吓家属、诱劝自首等恶劣手段，多数队员坚持斗争，少数队员在敌人威吓利诱下，向敌人自首了，有的脱离队伍躲了起来。

七月下旬，东二支队为了加强对定东游击队的领导，又派来了中共党员、连指导员陈兰台为特派员，黄佐回了主力部队。

八月八日，在解放区的龙川小参李家祠，由特派员陈兰台宣布正式成立“定东人民护乡队”，曾祥堃为队长，杨思行为政训员。授了大印，颁布了《定东人民护乡队布告》，星夜派人回定南张贴，部队返回定南活动。首先攻打天花联防队，在九曲桥与敌人发生战斗。战斗受挫，退至白沙冻，短枪组长叶文辉和后勤人员曾繁祥二人不幸被捕，第二天在穆湖惨遭杀害。部队当晚在小参民兵连支援下突围到小参，

在小参进行战评休整。后陈兰台调和平县政府工作，指定部队由曾锋负责。

白沙岫受挫后，粮食更加困难，得到了贝岭区人民政府支援。至八月十七日左右，定东人民护乡队配合东二支三营二连、九连部队深夜进军穆湖，时龙文安匪部已逃。第二天得知国民党七〇军败兵窜向穆湖，便歼灭了这股败兵，缴获美式步枪20支，子弹1000余发，俘虏20人。

八月二十一日傍晚，得知定南县城已解放，定东人民护乡队随即派人与南下大军的军管会联系，军管会指令部队驻县城待命。东二支队林镜秋因公到定南，把冒充东二支特派员身份的李兆芹，拘留押回广东审查，并代表东二支队把定东人民护乡队移交中共定南县委、定南县人民政府接管。经过整顿，后改为定南县第一武装工作队。

（定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根据有关档案整理）

更正

《定南县志·资料选编》第二辑中有如下二处，今予更正：第七页顺数第四行“马兴周”三字，应改为“李方”；第十五页倒数第四行应加“冯石林为候补代表”。